

# 进入新阶段后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 洪银兴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随着中国告别低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转向新常态,根据新发展理念,发展理论出现一系列的创新。

## 一、任务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

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摆脱贫困的经济学,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起飞的经济学。由指导经济起飞的理论推出的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GDP增长为目标的赶超战略;支持高速增长的高积累高投资率;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实施出口导向的外向战略;等等。可以肯定,这些以摆脱贫困为任务的发展理论对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起到过积极的指导作用。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是实现了经济起飞,相应地,经济发展理论就要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现代化。其任务是揭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进程和规律,并且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理论指导。按此要求构建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调整发展目标,不仅经济发展目标要更为全面,社会发展目标也要成为发展目标;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把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时所采取的那种发展方式延续到中等收入国家阶段,新的发展方式不仅要求有能力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还要求在节能减排等方面实现绿色发展;三是富裕人民,经济发展理论需要由摆脱贫困的发展经济学转向富裕人民的经济学。中等收入阶段富裕人民不仅指提高人民

收入,还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居民家庭财产明显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随之增加;二是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财富,特别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缩小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发展目标理论不仅反映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的特征,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要求。

## 二、发展的引擎由外需转为内需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发展开放型经济。出口导向和大力度引进外资曾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明显的引擎作用。现在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以及中国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增强,外需的引擎作用明显减弱。

在外需引擎作用减弱的同时,国内发展的引擎作用明显增强。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不仅已融入全球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强劲的发展能力,中西部地区强烈的发展需求以及针对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所进行的协调也提供了巨大的内需和发展机会。相比外需型经济,由于市场距离和信息获取等原因,内需型经济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更低。

基于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内需型经济替代外需型经济成为增长的发动机。就目前来说,致力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所产生的巨大需求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由实现小康到富裕人民存在较大的增加人民收入的空间,由此可以产生巨大的消费需求;二是虽然城市化率已经过半,但中国的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会拉动投资需求还会拉动消费需求,产生较大规模内需;三是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空

间更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创新起跑线的新兴产业,不仅能增强供给能力,本身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四是解决国内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会形成多种层次的内需。所有这些扩大的内需所产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对发展的引擎动力决不会比外需型经济小。

### 三、内需的主拉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高投资基础上。其理论依据就是哈罗德—多马模型(托达罗和史密斯,2014),该模型以GDP的增长为目标,以高积累低消费为手段,为生产而生产。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改变在低收入阶段实行的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所谓协调拉动,是要求三驾马车各尽其能。其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拉动潜力最大,2016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4.6%。实践证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大,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越高。

突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质上是以提高人民消费水平为导向,体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调整,即由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转向追求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一直强调的最大限度地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在这种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中得以实现的。

相比投资需求,中国现阶段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就中国的消费需求规模来说,正在富裕起来的13亿多的人口无疑具有巨大的潜力,但在消费需求结构方面潜力更大。人口年龄结构方面,老龄化社会减少储蓄但可能增加消费,儿童比重增大也减少储蓄但可能增加消费;人口收入结构方面,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部分人口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产业升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更为旺盛;相比发达国家市场,新兴市场的消费需求更为强烈,例如,家庭轿车的需求、住房的需求、信息服务的需求,在中国是从无到有的需求,其消费需求具有爆发性特点。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拉动消费,首要的是培育消费力。影响消费力的因素涉及收入、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提高人民群众消费力的基本途径: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稳定高就业率;三是社会保障全覆盖;四是在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改变高积累低消费状况;五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

现阶段消费业态的创新对消费的拉动效果非常

显著。例如,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迅速增长。尤其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正在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消费领域。消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不仅体现消费模式的优化,还会带动生产模式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对消费需求增长具有带动作用,服务和消费不可分,扩大服务消费可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领域的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还能提升消费水平。

### 四、改革的着力点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从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包括取消指令性计划,转向市场导向。由此激发的需求侧动力包括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微观的动力主要是指市场需求、市场选择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宏观动力是指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转向采用财政政策 and 货币政策实际上也是需求侧调控,紧缩性的、扩张性的或中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影响总需求。在需求侧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后,需求侧改革尽管还要继续深化,但主要是完善需求管理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涉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的目标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需要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正向目标是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替代所要“去”的产能、库存和杠杆。从这一意义上说,供给侧改革是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具体说有以下三方面改革目标:

首先,寻求供给侧的经济发展动力。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供给要素中,现阶段供给推动力消退只是指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能力的消退。而在供给侧还有其他动力可开发,尤其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的空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创新驱动和提高效率,都需要解决好相应的激励体制问题。

其次,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建立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企业家成长机制,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推动产业、产品优化升级;二是建立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培育工匠精神,加强质量管理和重塑精细文化;三是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乱市”用重典,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造诚信品牌。

最后,增强企业活力。企业是微观基础,对企业活力来说,来自需求侧的动力一般是市场选择的压力,来自供给侧的动力则是激励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这也应该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原则。现在供给侧影响实体经济企业活力主要是高税费、高利息和高负担。许多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从增强企业活力角度推进改革,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尤其要突出企业利益。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政府也要给企业让利。

## 五、增长原则由效率型增长转向包容型增长

在发展理论中,增长原则涉及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体现在增长成果的分配上。原因是在一定时期两者只能先后兼顾不能同时兼得,这就有谁为先的问题。一般说来收入有差距能促进效率提高,但收入差距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也可能影响效率。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很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矛盾。在此背景下,效率型增长已到尽头,转向包容型增长则可能兼顾效率提高。

何谓包容型增长?包容型增长的内涵非常广泛,包括可持续发展、共同参与的发展。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包容型增长又有社会主义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包容型增长需要突出解决低收入者问题。目前低收入者的数量还不少,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产生的消费需求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巨大的。应从以下两个途径改革和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革以来,先富起来的群体基本上是依靠资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面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明显扩大的现状,初次分配领域不能只是讲效率,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报酬的依据就是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再分配领域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作用一方面是通过减税降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克服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巨大差距,使落后地区、农村居民都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此外,是以财政为主导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需要指出,包容型增长不只是分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包容型增长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平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是要拉平收入,而是要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体现公平权利,即机会公平、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尤其是克服权利不公平

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现在扩大的收入差距主要不在劳动报酬的差距,而在参与收入分配后的各种生产要素(非劳动生产要素)占有的差距。由此产生的两极分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需要防止的。从表面上看,分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由要素参与分配导致,但深层次分析,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产生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不同个人所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因此,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缩小不同个人所拥有的参与分配的要素差别。实现既能做大蛋糕,又能推进结果的平等。

首先是起点公平。起点公平也就是增加劳动者的非劳动要素供给,从而使劳动者也能得到非劳动要素的收入。针对资本要素的差距,要求在体制上提供增加居民财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包括: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私人投资机会和渠道;鼓励私人创业;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收入;完善企业股权结构,允许员工持股,鼓励企业家持股和科技入股。农民也可以通过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获取土地收入。针对技术要素的差距,需要为居民提供平等的积累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机会。基本途径是推进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投资。

其次是过程公平,核心是机会公平。一是发展机会的均等,如投资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均等;二是竞争机会的均等,如公平竞争的环境,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公平获取的市场资源和信息,各个生产者可以平等获取市场资源。这些改革到位就能提供公平的机会均等的市场环境。

显然,转向包容型增长,体现中国经济发展能力的提升,也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发展水平上找到新的发展动力。人民群众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支持发展,在公平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可以减少发展的社会摩擦,发展的效率也能得到实现。

## 六、增长路径由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函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都是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驱动。中国在低收入发展阶段基本上是采取这种依靠物质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投资驱动则是建立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础上。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上述发展方式就行不通了。一是从要素驱动来说,物质资源严重不足,环境要求更为严格,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二是从投资驱动来说,建立在高积累低消费基础上的投资驱动难以为继,人民不可能继续长期忍受低消费。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由要素和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的核心是科技创新。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摒弃过去的跟随创新理论,模仿和引进创新至多只能缩短科技和产业的国际差距,不能改变后进地位。现在中国需要也有能力创新技术进步模式,与其他发达国家进入同一个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起跑线。一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互动,网络化、信息化使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机会对各个国家都是均等的。特别是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过后迎来新的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这次的机会中国不能再错过,发达国家能够发展的新科技、开发的新产业,中国同样也可以发展和开发,机会均等。二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自身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的能力,尤其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三是大国经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特别是中国还可以利用“举国”体制,有能力在某些领域进行集中投入实现重点突破。这样,中国的科技进步路径就有条件由过去的跟随发展转向引领发展,甚至在某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是推动科学和技术创新互动结合。中国现阶段科学研究水平也就是基础研究水平的国际差距比产业水准的国际差距小。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科学和知识的国际流动性比技术的流动性强,其流动遇到的障碍小。因此,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有效衔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不仅许多领域的大学及研究机构可能得到当今世界最新科学技术的推动,而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的路径,其意义不只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重要的是创新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不只是解决效率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无形要素实现要素的新组合,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扩散,是创造新的增长要素,而且会驱动一系列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比集约型增长方式层次更高,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新阶段特征。

## 七、发展战略由不平衡转向平衡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充分调动优势地区和产业的发展潜力,与市场化相配合,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实施了不平衡发展战略。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严重的国民经济不平衡问题阻碍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转向协调发展。这意味着不但不能再延续在低收入阶段实施的不平衡战略,还要通过实施平衡战略来补齐这些短板。否则很难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难说基本实现现代化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全体人民

的小康,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就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平衡发展的道路。

根据协调发展理念实施平衡战略,要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趋向均衡。当然,平衡发展不完全是抑长补短,除了去过剩产能和去库存外,总体上要求处于短板的部分加快增长。例如,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平衡战略要求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使其跟上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步伐;三次产业的协调,是要求三次产业的发展中服务业发展更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求补齐贫困地区短板,同时也要厚植发达地区的发展优势;补齐生态文明的短板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 八、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发展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落后的农业和农村,以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标志,创造了在“三农”之外带动“三农”发展的道路:以非农化解决农业问题,以城市化解决农村问题,以市民化解决农民问题。其效果非常明显,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但是,“三农”只是靠非农发展来带动,总是赶不上“非农”的发展。农业现代化仍然是现代化的短板。为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补上农业现代化为代表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这块短板。其路径就要由非农带动“三农”转向直面“三农”发展,“三农”直接成为现代化的对象和重点。

直面“三农”就是直接推动“三农”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即发展现代农业,从根本上改变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不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提高包括资本和土地的生产率,并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满足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量和质的需要。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解决谁来种田问题。农村现代化的重点是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才有能力吸引新型职业农民进入农村。

直面“三农”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中引入现代要素,一是科技要素,二是人力资本要素,其基础是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是消灭农村,更不是消灭农业;不是降低城市的地位去屈就乡村,而是提高乡村的地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在体制和发展水平上实现一体化。其内容包括:克服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在城乡之间按照产业本身的自然特性形成产业分工与产业布局。城乡在同等地位上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实现城

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本路径是城镇化。中国过去在实践中创造的城镇化道路指的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现在讲的新型城镇化则是倒过来,推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和要素通过“化”城镇而化到农村。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是城市要素的城镇化。过去的城市化是农民进城,现在的城镇化则要求城市发展要素出城,城市要素、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在已有多年发展小城镇的基础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实质上是推进城镇城市化,也就是使其具有城市功能。其内涵是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

直面“三农”必须关注农民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农民市民化,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现在提出的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指的是进城的农民市民化。这当然必要,但根本的还是要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不进城就能成为市民。这就要求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将提供给市民的机会和设施安排到农村城镇去,扩大城镇就业的机会,把高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设施办到农村城镇,增加农村特别是城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设施的供给。由此实现农民不进入城市就能享受到各种市民的权利。

## 九、由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转向以竞争优势主导全球化

中国前30年的对外开放实际上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其效果是明显的。全球价值链上外商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中国劳动力、土地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结合,使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面向全球的低成本加工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虽然中国企业进入的环节基本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高产值、低收益,但也确实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最大红利是借助全球价值链承接了先进制造业的转移。中国的企业通过边干边学、模仿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科技和工业化水平也得到了明显提高。

中国要由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经济强国转变,就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发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基于全球化的态势分析,过去的全球化是由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其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利益更大。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接着爆发的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经济处于长期的衰退和低迷状态,由此导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放缓。与其经济衰退相

伴,美国推行再工业化和保护主义,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实施了“美国优先”的投资和贸易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与此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过去中国是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被嵌入全球化的,现在中国将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式推动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意味着参与并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由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改变所决定,开放战略需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何为竞争优势?它与比较优势区别是什么?已有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上是针对企业的分工和贸易战略,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竞争优势理论提升到“国家”竞争优势的层面,以国家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单元,更多的指向国家层面的开放战略,但不排斥企业继续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理论突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理论则是“把技术进步和创新列为思考的重点”,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尤其是突出“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竞争优势”(波特,2002)。

当前的国际竞争集中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以往由中国资源禀赋决定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现在已不存在,同经济发展转向创新驱动相适应,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也应相应提升,争取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一是向研发、设计等产业链上游部分进行拓展;二是向物流、品牌、销售渠道等下游部分延伸;三是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递次攀升进入技术和质量要求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元器件制造环节。这样,谋求竞争优势的基本途径是依靠科技和产业创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能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量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这体现增长的内生性和创新驱动性。表面上看是由外向拉动转向内生发展,实际上是以科技和产业创新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内生的创新引导开放。

谋求竞争优势的开放型经济,需要利用开放来支撑创新。当今的国际经济是要素流动为主导的经济,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过去发展的重点在增长,增长基本上是资本推动的,技术和管理等发展要素跟着资本走,相应地,开放型经济基本上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现在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各种创新要素是跟着人才走的,相应地,开放型经济需要通过引进高端创新人才来利用其他国际创新要素。

■ 《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5期,约15000字